

语言文字学研究

二语习得研究反思

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总结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局限性, 结合我国实际讨论二语习得研究的不足, 认为二语习得研究应具备大格局眼光、问题导向、跨学科视野及方法论意识, 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下: 梳理二语习得研究有价值的理论、方法、研究模型及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验结论, 整合相关学科特别是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研究模型。

关键词: 二语习得; 母语; 目的语; 偏误分析;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8)03-0053-09

收稿日期: 2017-12-20

DOI: 10.15983/j.cnki.sxss.2018.0512

作者简介: 王远新, 男, 新疆石河子人, 文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二语习得的全称是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①通常指习得母语后学习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 狭义指学校教育, 广义还包括自然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中介语理论使二语习得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我国有长期的第二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史, 随着外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 以及汉语国际传播的兴起, 二语习得研究有了质的飞跃。高校设置了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点, 研究成果也逐年递增, 期刊发文量逐年上升, 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学位论文增长速度更快。^② 这使得我们要深入反思二语习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式尚未建立

从早期的对比和偏误分析、中期的中介语研究、近期的认知研究可以看出, 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总体特点是跟随语言学和心理学主流, 尚未建立起自身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

(一) 早期研究

1. 对比分析

早期二语习得研究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 语言学习是行为形成的过程, 语言发展由一系列习惯养成。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 层次性是语言结构的本质属性之一, 语言研究应重点关注语言形式及其结构层次。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结合, 催生了二语习得

^① 二语习得者的第一语言通常指本族语或母语, 多语或非本族语背景的语言人掌握的“第一语言”不一定指本族语或母语。

^② 据戴伟栋、周大军2005年统计, 1984—2004年语言学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450篇。笔者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检索“二语习得”(检索日期: 2017-11-14), 2005—2016年, 北京大学核心期刊1 059篇(2010—2016年每年80篇以上, 年均103.8篇), 南京大学核心期刊732篇(2010—2016年每年50篇以上, 年均68.6篇); 学位论文4 724篇(学士论文7篇, 硕士论文4 543篇, 博士论文171篇)。

研究的对比分析学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这种学说认为,应在对比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结构的基础上编写教材,实施教学。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二语习得的主要困难归咎于母语和目的语的差异,并认为对比二者的结构异同,可预测学习者的错误和学习难点。这是因为:第一,学习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母语形式、意义及组合特点连同与母语相联系的文化迁移到第二语言系统,母语正迁移有助于习得,负迁移是产生偏误、导致学习困难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原因。第二,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与习得难度相对应,差异越大,母语干扰越大,习得难度就越大,结构差异度构成了目的语习得的难易度等级。

对比分析学说的根本局限性在于,采用单纯的语言形式对比分析法解释复杂的心理认知问题,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1)对比分析法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论”,认为语言行为是外界“刺激—反应”的结果,语言习得是机械模仿的过程,忽视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2)二语习得依赖于第一语言,是逐渐脱离第一语言的过程,第二语言学得越多、越好,第一语言的辅助作用就越小。就此而言,第二语言能力的获得具有动态性,相关研究也应体现其动态性,而早期的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3)对比方法存在缺陷。早期对比研究常以目的语为外部参照,并将目的语和母语置于同一对比框架。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母语和目的语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之处,传统对比法难以应对不同语言系统的不对等现象及“你有我无”的语言范畴;二是未考虑学习者产出的中介语系统。(4)将母语和目的语系统的差异度等同于语言习得难易度不合逻辑,因为两种语言结构或特征差异度与学习难易度并非正相关,二者的差异虽是学习难点,但学习难易度因人而异,有时差异大的结构项学习效果更好,差异小的却难以掌握到位。(5)母语负迁移的研究结论有时与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不符,指导语言教学实践的价值有限。

2. 偏误分析

建立在母语和目的语结构对比基础上的偏误分析是二语习得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其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关注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有助于教师了解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水平,更好地规划教学内容和重点。(2)证明了母语负迁移并非导致偏误的唯一原因,并通过偏误分析描述习得过程,为二语习得成为独立研究对象奠定了基础。(3)提出了描写和分析偏误现象的典型程序。^①

偏误分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忽略了自然情景下话语材料的搜集以及话语材料的同质性,忽略了学习者习得过程的回避策略,难以准确反映学习者的真实习得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偏误分析的全面性及结论的可信度。(2)主要从目的语角度关注学习者的偏误,忽视其习得系统中的正确部分,只能说明学习者学习水平与目的语的差距,无法提供充足材料以描述其中介语系统,难以揭示偏误产生的内在因素。(3)过度关注共时的偏误现象,忽略了语言习得的动态发展过程,难以揭示学习者不同阶段语言能力的特点。大量偏误分析只是采集学习者某一时点的语言样本,即使一些名义上的历时研究,也只限于搜集几个时点的语料,忽略了纵向跟踪调查,难以呈现学习者不同阶段产生的偏误,无法全面描述偏误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4)不同类型的语言在母语干扰、二语习得特点和规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有些对比基础上的偏误分析缺乏类型学眼光及相应研究方法,影响了成果的解释力;有些研究虽考虑了语言类型学特点,但未能深入研究母语和目的语的接触关系,难以触及二语习得的本质,因为母语干扰是典型的语言接触现象,且伴随二语习得的全过程。受上述局限性影响,二语习得的研究个案虽不断增加,却不能充分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有效指导二语教学实践。

(二) 中期研究

中期二语习得研究受心灵主义心理学和普遍语法理论影响。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机制学说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无法解释语言习得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儿童能够理解并使用从未听说或接触过的语言,能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二是即便在有缺陷的语言环境中,儿童依然能够系统地获得语言。人类的这种语言能力来自人脑功能,不是外界的影响,无法用“刺激—反应论”解释。受此影响,二语习得研究者将重心由母语和目的语结构异同对比及习得偏误分析,转向学习者及其习得的语言系统即中介语系统。中介语研究由偏误分析发展而来,但不止于此,而是更加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组织功能。

^① 偏误分析的5个典型程序:搜集偏误语料,鉴别偏误,描写偏误类型,解释偏误影响因素,评估偏误分析在习得和教学中的作用。

中介语指二语习得者在理解和生成目的语时产生的定型化语言系统,是独立于母语和目的语、高度结构化、可观察的动态语言输出系统。换言之,它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习得者建构的一种新的过渡性语言,具有自然语言的基本特征,即其语音、词汇和语义、语法、语用等均具有独特的规律。中介语系统兼具静态和动态特征,前者主要指学习者在二语习得某一阶段建构的中介语系统,后者指中介语是不断变异的连续体。母语无意识的迁移、学习训练导致的迁移、目的语材料的泛化、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运用等,都会影响中介语的产生及其变化。随着中介语理论的提出,二语习得研究从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应用语言学分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后期中介语研究虽有逐渐脱离生成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趋势,但其本质上仍受制于普遍语法。总体而言,中介语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

1. 理论依据与研究实践相悖

受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影响,二语习得研究在接受普遍语法观特别是普遍语法可及性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语言结构对比分析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对比分析的结果属语言能力,不属于语言运用,并以此反驳对比分析无用论:“既然外语教师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能力,他就应该将目的语的语法与学生母语的语法进行对比。批评对比分析无助于预见学习中发生的错误的人,看来未能明确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应用。教师不应该假设所有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描写都与事实纹丝不差,都真实地描述了理想的说话人的语言能力。而且即使我们能够对两种语言进行精确而完整的描写,比较的结果也未必能预见犯错误的情况。要确切地知道学生会犯什么错误,需要大量的关于语言运用方面的信息。”^①研究者一方面强调对比结果属语言能力,一方面又认为学习者产生的错误属语言运用,这是一个层面的悖论。普遍语法的语法判断即“语感”源自研究者“内省”或被试自报获得的母语隐性语法知识,以此推断实践性极强的复杂习得现象及二语习得能力特别是语言运用能力,解释力有限。更大的悖论是,乔姆斯基一开始就宣称,他的理论不是为教学服务的,而对比分析以教学为主要服务对象。^[1]二语习得研究的实践性极强,普遍语法理论框架下的“理论假说先于实证”的演绎推理研究模式,只能解释习得结果的外在语言形式,这又与普遍语法揭示说话人内在语言能力的目标相悖。

2. 研究的问题以偏概全

中期二语习得研究以描述和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为目标,认为二语习得受普遍语法规则特别是语法可及性规则主导,尝试回答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否受到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普遍语法规则的支配等问题。这类研究通常将二语习得等同于二语语法习得,有以偏概全之嫌。以二语习得过程中语言项目习得顺序为例,学习者习得特定语言项目具有动态性,即从零到完全掌握的渐进过程。一些研究认为,不同年龄段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习得英语否定句和疑问句时,均需经历4个阶段;有些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认为无法证明其习得顺序的有效性。不同语言项目的习得虽有先后之分,但这类研究有3方面的局限性:(1)《英语语法大全》列举的规则多达上千条,将部分语言项目如语素、否定式、疑问词和某些疑问句规则的习得顺序推及语言习得整体,并声称可按此顺序规划语言学习,这种以偏概全的类推不可取。(2)这类研究大多可证明语言项目使用的正确率和错误率,很难证明其习得难度,更不能说明习得的自然顺序。(3)不同母语的习得者有不同习得特点,习得的错误率、难点、难度等均有差异,习得顺序也不大可能相同。如果二语习得者都按相同顺序习得某类规则,就不应该存在母语干扰导致的负迁移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2]

(三) 近期研究

二语习得研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研究目的和内容逐渐清晰,即探讨个体学习者(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者的语言(不同阶段习得的语言)、习得过程(二语获得方式)、教学语言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等,描述学习者整体语言能力和各项语言技能的发展过程、方式、规律及影响习得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揭示二语习得的过程和本质。简言之,探讨和解释学习者如何获得、为什么能够获得、获得怎样的第二语言。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从中介语理论出发研究二语习得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在认知科学所揭示的人类认知规律的框架内考察二

^① 迪·皮德娄(Rebert Di Pietro)《语言结构对比》(1971),转引自潘文国、谭慧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语习得问题,其研究动力不再局限于教学需求,而是要满足人类基本的认知需要。^[3]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学习者的心理、认知过程和机制、语言变异、语言加工能力等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受儿童语言习得研究、认知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影响,语言的社会认知心理、社会化、交际策略、语用特点也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热门话题;借鉴跨语言对比研究的新进展,并将其应用于第二语言的不同习得阶段、习得水平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二语习得研究。影响二语习得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研究受到普遍关注,其中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的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情感因素、认知特点等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立足普遍语法理论,强调学习者的共性特征、母语迁移、语内迁移等因素;二是学习者社会特征(性别、年龄、学习经历等)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受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影响,这类研究强调学习者个体差异导致的变异问题。影响二语习得外部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学习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家庭、学校、课堂等)、语用心理特别是语用迁移、交际策略等。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二语习得研究从母语和目的语结构对比扩大到语言习得及其认知机制研究、内外部因素及其互动研究,研究方法呈跨学科性、多元化特点。然而迄今为止,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框架尚不清晰,研究范式的建立仍任重道远。

二、我国二语习得研究之不足

从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近些年以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看,二语习得研究普遍存在语言描写和跨语言对比研究基本功训练不够、缺乏系统研究观念、研究对象缺乏同质性、习得过程考察不足、习得影响因素分析不全面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

(一) 基本功训练不够

语言描写和跨语言对比基本功训练是二语习得研究及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单一语言研究相比,二语习得研究难度更大,对研究者的要求也更高,这是因为:

第一,研究者需掌握或基本掌握二语习得者的第一语言,并对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特点有深入认识和精准把握,这是跨语言对比和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的基本条件。研究一种语言尚且不易,当研究对象同时涉及习得者的第一语言、目的语及其产出的中介语系统时,研究难度更大。面对不同母语学习者或多语学习者时,涉及的变量增多,进一步加大了研究难度。

二语教学以目的语为教学语言,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二语习得,也是出于学习者情感的考虑。比如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各不相同,如果用某一类学习者的语言辅助教学,不仅存在跨语言对比不对等的问题,还会引发学习者的母语情感问题。即使在学习者的母语环境比如在海外孔子学院教汉语,目前也提倡使用目的语教学。这是教学语言的要求,对二语习得研究而言,要求则有所不同。无论何种类型的二语习得研究,都会涉及学习者的母语能力、二语习得背景、母语和目的语对比等问题。研究者如果不懂学习者的语言,很难做好语言对比和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系统的描写,遑论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些二语习得研究者特别是在读研究生,既不懂习得者的母语,也未能很好地把握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却以留学生或国内少数民族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分析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其研究只能是隔靴搔痒。有研究者认为,不懂学习者的母语,可以参阅相关研究成果。以他人研究成果作跨语言对比的例证或许可行,但要解释偏误产生的原因和中介语的特点,则很难触及问题的本质,所做的偏误分析本身就可能存在“偏误”,中介语特点的解释也可能浅尝辄止。对有过系统二语学习背景的二语习得专业研究生而言,更适合围绕所学语言的本体问题选择研究题目,这样至少可为语言结构分析、跨语言对比、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如果连研究对象的母语和目的语系统都未研究透彻,怎能研究清楚二语习得者产出的中介语系统?如果说二语习得方向研究生必须结合专业确定论文选题,那也无妨。因为建立在研究对象母语或目的语本体分析基础上的数据和结论,完全可服务于二语习得研究,可为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材料支持和科学依据。这样,就可将语言结构、跨语言对比与二语习得研究结合起来,满足专业方向的选题要求。

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在于交流,需深刻体悟所学语言主体的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跨语言对比研究远不能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不仅应深刻把握研究对象的母语、目的语和中介语的结构

特点,还需深入认识母语和目的语的文化以及语言主体的认知和表达世界的特点。

第三,做到以上两点还不够,二语习得涉及多个学科,研究者不仅应充分了解母语、目的语及中介语的研究成果,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及调查研究方法,把握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还应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积累。这样才能找准研究问题,开展可持续性研究。^①不具备这些条件,很难深入探讨二语习得问题。

(二) 缺乏系统研究观念

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讨论具体问题,都需要有系统观念,或在分析过程中体现系统观念。这不仅包括研究对象本体内部系统,还包括与本体相关的外部系统以及二者的联系。纵观二语习得研究可以看出,一些研究缺乏系统观念,研究成果也缺乏系统性。比如汉语声调迁移研究,^②各类研究无论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同质性,其结论几乎没有相同的。^③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孤立分析声调习得的偏误规律及其学习策略,忽略语音要素间的关联,其结论难以指导二语教学。这类研究大都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不同质;二是研究个案积累不够;三是缺少类型对比、系统观念及相应研究方法,孤立研究二语习得的某一环节。

汉语语法习得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某一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话题常常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④各类句法习得成果数量差异之大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跟着汉语语法研究转,未能充分考虑二语习得及中介语的特殊句法现象、习得者母语与汉语语法的可比性及习得难易度等问题。二是句法系统各要素、子系统相互关联,在没有全面认识甚至未能搞清汉语句法特点的基础上,抽取某些句式作二语习得研究,有以偏概全之嫌。

^① 英汉对比语言学家杨自检认为,跨语言对比研究需具备6方面的基础:“一是比较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二是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是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四是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五是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六是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杨自检《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序。朱永生等《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XIV页。

^② 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检索“汉语声调+习得”(检索日期:2017—11—14),1984—2016年,期刊论文85篇(北京大学核心期刊11篇、南京大学核心期刊6篇),学位论文138篇(硕士论文132篇、博士论文6篇)。

^③ 赵元任认为,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声调,困难在调域,不在调型。《《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赵金铭调查8种母语为有声调语言的留学生,证实了赵元任的结论。《《从一些声调语言说到汉语声调》,见朱德熙等《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余霭芹的研究表明,外国人学习汉语声调时,容易度依次为阴平、去声、阳平,上声最难掌握。《《调教法的商榷》,见《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沈晓楠考察美国学生调型和调域错误,进一步证实了赵元任的观点,但具体结论与余霭芹相反,即美国学生学习汉语阴平和去声的难度大于阳平和上声。《《关于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世界汉语教学》1989年第3期)王韞佳以美国学生为调查对象,认为调型和调域错误同在,但发音人阴平和去声掌握较好,错误主要在调型;阳平和上声掌握程度虽不及阴平和去声,但调型错误最先被克服。这又与余霭芹的结论大致相同。这些研究虽有实证基础,但结论有明显差异,无声调语言少数民族学习者汉语声调习得研究存在同样问题。《《也谈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徐思益、高莉琴认为,受母语音高影响,维吾尔族常把汉语四个声调分别读为降升调和降调:单音节词一般读降调,双音节词第一音节读降升调,第二音节读降调。《《关于维吾尔语的重音、声调问题》,《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朱学佳认为,维吾尔族常将普通话阴平发成33调,阳平发成23调,上声发成31或22调,去声发成31调。双音节词第二音节的读去声,有的读阴平。《《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声调变异状况的声学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3期)》

^④ 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检索“把字句+习得”(检索日期:2017—11—14),1984—2016年,图书1部,期刊论文71篇(北京大学核心期刊13篇、南京大学核心期刊6篇),学位论文129篇(学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17篇、博士论文11篇);检索“被字句+习得”,图书3部,期刊论文201篇(北京大学核心期刊23篇、南京大学核心期刊13篇),学位论文394篇(学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73篇、博士论文20篇);检索“否定+习得”,图书6部,期刊论文229篇(北京大学核心期刊32篇、南京大学核心期刊21篇),学位论文425篇(硕士论文370篇、博士论文43篇);检索“了+习得”,期刊论文8篇(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核心期刊各1篇),学位论文14篇(硕士论文13篇、博士论文1篇);检索“存现句+习得”,期刊论文40篇(北京大学核心期刊8篇、南京大学核心期刊6篇),学位论文50篇(硕士论文47篇、博士论文3篇)。其他一些句式成果或很少,或暂付阙如。

又如语言习得临界期或关键期研究,一些研究未充分认识语言习得的本质,就全盘接受普遍语理理论“语言习得机制”学说及其相关的实验结论,认定二语习得的临界期或关键期。一些研究认为小学阶段是关键期,强调第二语言教学应从小学开始;有的实验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越早越好”,导致一些幼儿园的第二语言教学“从娃娃抓起”;有的实验则认为,未发现某一年龄段的学习者在二语习得方面占绝对优势,如能严格控制其他因素,少年和成年的第二语言学习优于儿童,因此第二语言学习不宜过早。以往语言习得关键期的实验常囿于二语习得局部问题,如语音或语法规则的掌握程度和特点,这虽能说明部分问题,但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交际能力的高低不限于发音和语法规则的标准程度,词汇和语义、表达等均涉及交际能力。以关键期确定第二语言学习时间,有“生理因素”决定论之嫌。二语习得不仅涉及生理因素,还与社会文化因素、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性格特点和心理因素相关。年龄无疑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但以往关键期的试验多局限于语素和句法习得的调查或实验,未必能够说明问题。^[4]

总之,语言本体内部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忽略与内部系统密切相关的外部系统及二者的关联和互动的二语习得研究,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指导二语教学的作用更为有限。

(三) 研究对象缺乏同质性

多民族国家留学生的母语背景、文化习俗、二语习得情况及目的语能力等均存在差异,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也有显著不同。因此,在开展二语习得研究时,需注意研究对象的同质性。有的研究者以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如东南亚或中亚国家留学生作为观察对象,这就很难保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因为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分属汉藏、南亚、南岛等语系,中亚诸国的语言分属阿尔泰、印欧等语系。一些国别化研究如缅甸或泰国学生的汉语习得研究,同样因这些国家多民族、多语言等特点,存在观察对象不同质的问题。只有以某国相同母语人的二语习得者作为观察对象,才能保证在观察对象同质性的基础上简化研究变量,使研究问题、因素分析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不过,目前这类研究还不够充分和深入,这正是我们主张多做个案积累的缘由。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具备了对比研究的条件。在不同类型个案对比基础上提炼的规律和认识,不仅比较客观稳妥,结论也更有针对性。

(四) 习得过程考察不足

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对其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影响,甚至一度受克拉申(Stephen Krashen)语言输入假说影响,重点关注二语习得者的语言输入。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回答习得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重点关注语言输入比如二语习得者如何加工和理解输入的语言,不顾及其他,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一方面,语言习得过程中,输入能力总是强于输出能力;另一方面,习得者的语言输出包括调整过的语言输出是否有助于并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二语习得同样值得重视。一些考察性别差异对语言输出影响的研究认为,交谈中,男性学习者说得多,女性学习者听得多,并由此推断男性习得多得益于输出,女性多得益于输入。这样的结论未能触及语言输出如何影响二语习得的本质。事实上,二语习得输入和输出过程及其各类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重要。^[5]

(五) 习得影响因素分析不全面

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十分复杂,以外国留学生在汉语文化环境中学习汉语为例,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母语结构特点、汉语学习经历、在华期间交往人群、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和态度甚至性格特点等均有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其汉语学习成效。如果不研究他们的母语结构特点及其对汉语学习的影响,不调查其语言使用特点、学习环境、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和态度、性格等因素对汉语学习的影响,影响汉语学习成效的因素分析就会因缺少不同层面的同质性数据支持而影响研究深度。

再以二语习得领域最常见的偏误分析为例。偏误现象错综复杂,且由多种因素导致。首先,需依据合理的指标鉴别偏误现象,如区分偏误和失误等。其次,要确定偏误类型,如隐性和显性偏误,语音、词汇和语义、语法、语用偏误等。然后依据一定的鉴别标准在特定范围内做进一步分类。在合理分类基础上才可能科学描述偏误现象,而合理的分类和科学的描写决定着结论的可信度。确定偏误类型后,一方面需离析偏误影响因素做同质性测量;另一方面需针对不同偏误类型分析影响偏误的因素,而影响因素的分析需一定数据和典型案例支撑。总之,只有在科学鉴别指标的基础上,合理地确定偏误类型、离析偏误影响因素,并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加以分析,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的学习策略和教学建议才具有针对性。

学校教育背景与自然接触状态的二语习得有诸多不同。常见的现象是,学校教育背景下的习得目的明确,强调习得方法,习得程序按部就班、过程循序渐进,但习得者的偏误频频发生;自然接触状态下,无

明确的习得目的和方法,习得环境差异大,习得过程无序,但习得速度更快、效度更高。学校教育背景下二语习得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是教学法、教学内容、教学语料、教学设计问题,还是纠偏机制、学习者个体差异问题?目前的研究均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学习动机、学习能力、性格特点等个体差异都会影响二语习得,因涉及变量太多,难以控制和测量,或很难离析做同质性分析,导致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总之,语言习得涉及的问题多,影响习得效果的因素复杂,涉及的变量很多。即使分离某些因素做同质性测量,不仅难以确定主变量和次变量,而且有观其一点不及其他之嫌。这正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难点,需研究者具备更高的学养。

三、二语习得研究需具备的眼光和意识

二语习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二语习得研究既涉及不同背景学习者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加工过程、中介语的形成及特点、语言运用等层面,还涉及语言结构分析、跨语言对比、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言认同、语言心理和认知机制;既涉及宏观的语言文化和社会问题,如国家语言战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语言生活、社会文化环境、语言价值观、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还涉及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总体来看,二语习得研究者应具备以下眼光和意识。

(一) 大格局眼光和问题意识

大格局眼光和问题意识是同一论题的两个方面。大格局眼光依赖研究者对问题的宏观把握,要求其站得高、看得远。强调大格局眼光并不是倡导做宏大叙事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必须立足本体论,从微观问题做起。微观研究的前提之一是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来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比如前文提及的汉语语法习得研究,只是孤立地分析某类句法习得过程和特点,难以有效指导二语教学。再以新疆双语教育研究为例,在尚未摸清语言习得和教学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同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及相关语言态度)的情况下,新疆便制定出双语教学政策,出台了相关举措,并采用行政化手段大面积推广,结果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理应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找出新疆双语教学政策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为下一步的正确决策和政策的执行提供科学依据。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不去论证政策的缺陷,不去揭示认识和操作层面的失误,却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既定政策下的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教学法、习得偏误等问题。未搞清宏观问题,微观研究既无学术价值,也无实践意义。这样的微观研究不仅存在顾及一点不及其余的弊端,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甚至会陷入学术误区。

二语习得不仅涉及母语、目的语及习得者产出的语言系统,还与学习者个体因素如语言学能、学习动机、语言态度、创造力及学习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以往的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说,都难以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揭示其特点和本质。以语言迁移为例,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母语行为会带到其第二语言的言语行为之中,学习者的母语规则与目的语规则不同,会出现母语干扰或负迁移。心灵主义学习理论则认为,许多偏误现象由学习者目的语知识泛化导致。不同理论都承认语言迁移现象的存在,但对影响正负迁移因素的分析 and 解释则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者需汲取不同学说、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长处,立足于宏观把握、一点切入,开展扎实的个案研究和综合性探讨。当不同类型的个案和综合性探讨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望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只是依据某一种理论学说、研究模式或方法开展二语习得研究,其结论很难做到全面客观。

(二) 跨学科视野和方法论意识

1. 跨学科视野

以往的研究证明,只靠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有效解决复杂的二语习得问题,研究者需具备跨学科视野和掌握多种研究方法的能力。当二语习得研究已呈现出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和多元化特点、体现综合研究优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3点:

(1) 采用相同或不同理论和方法得出不同研究结论的问题。学术研究存在不同观点非常正常,但如果采用相同或不同理论和方法研究同类问题得出的认识长期难以达成共识,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这就需要认真反思我们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甚至需要反思研究的问题是否为学术真问题。潘文国、谭慧敏指出:“如果同样的材料,用一种‘理论’分析出来是‘异’,用另一种‘理论’分析出来是‘同’,那究竟是理论有问题还是材料有问题?如果是材料有问题,我们就回到了‘理论决定材料’的怪圈;如果是理

论有问题,那我们寻求某种理论支撑的意义又何在呢?”^{[1]282}

(2) 相同或不同类型研究间的可验证性和可对比性问题。如前所述,如果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具有同质性,而不是不同变量、不同因素混杂,只要对比维度恰当,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研究数据、结论就应该具有可比性。否则,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其学术和应用价值不言而喻。

(3) 语料库的应用。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语料库的建立及各类语料(本族语、目的语、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介语、口语、书面语等)的对比分析,为满足不同研究目的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话语材料。从已有利用语料库开展的二语习得研究看,或是采用量化手段验证已有的理论假设,或是提出新的观点。需强调的是,在语料库运用方面,无论他建还是自建语料库,既应考虑语料库的库容量,以及语料的来源、历史层次、语体特点等的可比性,还应考虑语料的真实性、代表性等问题。

2. 方法论意识

(1) 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使用。从方法论角度看,定性和定量研究各有长短,研究者应根据研究问题和对象,合理选择或综合使用不同方法,不能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不同方法各有用途,如果结合得好,可以发挥综合优势。

定量研究的最大优势是,通过数据分析全面描述二语习得某一问题的细节,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硬气”,且具有可重复性和可对比性。简言之,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事实描写,其局限性是难以做深入的解释。定性研究主要关注学习者语言学能、学习动机、语言态度、社会特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与二语习得的关系。一些倡导定性研究的学者认为,量化统计数据有可能掩盖二语习得的复杂多变性,且对个体化差异缺乏解释力,因此更加推崇学习日记、对话、个人叙述及相关的个案研究方法。比如学习日记不仅是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学习手段,日记中的语言学习过程反思、自然流露的学习焦虑以及对不同社会语境的态度等内容,经研究者提炼加工和分类,可作为论证其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的重要证据或案例。此外,在习得者意识不到被观察的情景下,通过隐匿观察、诱导访谈等手段采集对话语料,通过刺激回忆、提示应答和产出、自我评估等方法采集个人叙述,也是定性研究常用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个案研究,也具有质化研究的特点。

个案研究可涉及单一个案,也可同时考察多个个案;可以是描述型或解释型个案,也可以是描述和解释结合的个案。个案研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较灵活地获取不同情境下的自然语料,有助于分析观察对象的个体差异性,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其最大局限性是在于,研究者难以完全避免有意无意的主观干扰,研究成果难以复制或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限。如能将量化分析和质化研究有机结合,既可取长补短,又可深化研究。

(2) 正确对待国外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经验。国外的二语习得研究先于我国,自然需要借鉴,但应该是批判性的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二语习得者的母语、目的语和中介语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二语习得的难点和顺序、学习目的和动机、教学策略、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均各有特点,我们不应将其研究成果奉若神明,更不能照搬。从国内一些二语习得研究成果看,其研究框架、理论方法甚至测量工具都照搬国外,或略加改造,它们究竟多大程度上适应我国的二语习得实际值得反思。

四、二语习得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泰勒(Andrea Tyler)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各种L2教学方法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一般来说,支撑这些方法的语言结构和性质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变化……这种传统的语言观构成了许多L2语法和教科书的基础,它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系统,独立于其他认知和社会能力,作为一个与一般的认知加工和概念结构相分离的独立系统,语言习惯上被认为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属性进行运作,其中大部分是任意的、异质的和神秘的。”^{[6]520-521}当前,二语习得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梳理二语习得研究有价值的理论、方法、研究模型及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验结论,整合相关学科特别是认知语言学、跨语言对比(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及其相关的各类研究模型,而不是跟着语言学和心理学的潮流亦步亦趋。

这里重点讨论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研究的关系。认知语言学重点关注语言、交际、认知及其相互关系,认为语言是语言使用者认知加工的表现,而不是脱离语言使用者的孤立或自在系统。泰勒(Andrea Tyler)指出:“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体现于各个‘层面’上的重现、有意义的模式以及组织原则。这种理论

抛弃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理念,即语言是由割裂的、具有独自组织系统的子模块构成的。”“学习任何语言都需要记住大量的词汇。所有语言都有‘不规则’的现象,如英语中必须记住的不规则过去时。所有语言都有一些系统无法直接解释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此外,每种语言可能会凸显出不同的人类经验和概念化的空间物理世界,因此学习者会面临如何匹配 L1 和 L2 之间差异的挑战。然而,认知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对语言理解的重要进展,似乎真正有益于 L2 学习者。”^{[6]524-525}

语言学能、学习动机、情感因素、语言态度、语言文化认同等都会影响二语习得的成效,它们均与语言和文化认知有关。因此,语言和文化认知的理论和方法均有助于二语习得研究。儿童语言习得与成人语言学习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上,认知语言学建立的语言、语言使用研究及儿童语言习得模式等,均对二语习得研究有直接启示。

二语习得过程本质上是语言接触过程,学习者不是简单模仿并输入目的语语料和规则,而是要经历连续的认知分析与加工过程。在母语和目的语接触条件下,不同语言的学习者都会产生中介语,且不同的中介语均具有系统性。不同学习者记忆能力如何制约语言构式类型及其习得顺序、不同二语习得注意力指向的差异怎样影响二语习得?它们与学习者的母语认知有怎样的关联?概念迁移总是伴随着意义的迁移,二语习得过程中语义扩展与概念迁移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语用系统与语用经验对语义、语用迁移有着怎样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狭义的二语习得均不如第一语言习得成功,这其中与语言认知有怎样的联系?与之相关,第一语言习得为何不存在二语习得中常见的“天花板”现象?等等。这些均与认知语言学研究有直接关联,因此,双语或多语环境中语言接触及其产生的语言变异、变化规律及认知加工模式研究等,也有助于二语习得研究。

语言中的不同构式为说话人在特定场景、针对不同交际对象和话题做出恰当选择提供了可能性。构式是认知语法学的研究重点,其成果可为二语习得研究所用。比如怎样处理构式的输入,构式的处理方式、范围和程度如何?随着学习时间的延长,显性和隐性构式的习得及习得顺序怎样,影响习得成效的因素有哪些?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匹配度高低与构式习得难易度是否存在正相关,如果存在,形态与非形态语言的习得者有怎样的区别?等等,这些都需要汲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6]556-597}

[参 考 文 献]

- [1] 潘文国,谭慧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2] 戴曼纯.“自然习得顺序”质疑[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
- [3] 杨连瑞,等.中介语语言学多维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4] 辛柯,周淑莉.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临界期假说实证[J].外语教学,2006(4).
- [5] 文秋芳,王立非.二语习得研究方法35年:回顾与思考[J].外国语,2004(4).
- [6] NICK ELLIS,PETER ROBINSON.认知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M].鹿士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责任编辑 杜 敏]

Considerations on Several Issue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ANG Yuan-xin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It points out the limi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a broader research view scope, the problem-driving approach, cross-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ain tasks for the research of SLA in China is to review the different theories, methods, research models, and findings in SLA and combine SLA wi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ve linguistics thereby constructing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mode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LA; native language; target language; error analysis; research paradigm